



青运领袖，风范长存

——深切缅怀蒋南翔伯伯

○何吉林（1970届无线电）

我的父亲何礼，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自“一二·九”运动起，就是蒋南翔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在他领导下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我从孩提时代起，认识的第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就是蒋南翔伯伯。1965年我有幸考入清华大学，又成了蒋校长的学生。今年是蒋南翔伯伯诞辰110周年，作为晚辈，我很崇敬这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教育家，特撰写此文以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两张照片

1949年6月，应蒋南翔同志之邀，我父亲从沈阳调往北京，参与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工作。当时蒋南翔担任团中央副书记，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学生工作部部长和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我从3岁开始记事起，到7岁上小学之前，一直住在团中央大院，因此认识了蒋伯伯。

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决定开国大业最重要的会议。我父亲作为全国青联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带回来一本珍贵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这本纪念刊就成了我经常翻阅的画册。从纪念刊的照片中，我惊奇地发现，除了有我父亲外，还有住在团中央南小楼的蒋南翔伯伯和荣高棠伯伯（团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和我父母同住北小楼的杨

述伯伯（团中央宣传部长）。因为住得近，孩子们经常互相串门，所以与几位长辈很熟悉。后来我才知道，蒋南翔和杨述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的成员，荣高棠和我父亲是全国青联代表团的成员，他们都是新中国开国大业重要会议的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初期的工作中，开创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为新中国青少年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我父亲随蒋南翔调入清华大学工作。他当时因肺病不能担负繁重工作，但蒋南翔依然让我父亲接替他的政治辅导处主任工作，这是他在清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项创举，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让我父亲接替周培源担任清华



政协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合影，
1排左起：杨述、冯文彬、胡耀邦、高景芝、张本，
2排左起：宋一平、许世平、张凡、王治周，
3排左起：王明远、陆平、蒋南翔



政协一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代表团合影，1排左起：梅益、荣高棠、曹禺、范小凤、龚澎、董昕、杨文，2排左起：徐盈、杨涤生、廖承志、何礼、何其芳、钱三强、吴晗

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体现了他对老战友的信任和倚重。我记得有时晚饭后，父亲会带我从小住的照澜院走到蒋伯伯住的新林院2号去谈工作，蒋伯伯总要亲切地询问我在清华附小学习的情况，然后才开始大人的谈话。后来我父亲肺病严重发作，才不得不离开清华的工作。

“一二·九”时期创办的两份青年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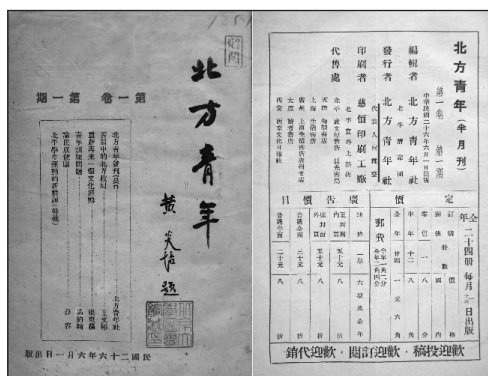
蒋南翔同志长期领导青年工作，他非常重视通过办刊物来引导教育青年。在清华学习期间，他就担任过《清华周刊》的主编，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同学们欢迎。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我父亲还协助蒋南翔创办了党领导的青年刊物《北方青年》和《战时青年》。

1937年4月，北平地下党学委创办机关刊物《北方青年》，由学委书记蒋南翔任主编。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派何礼（何维登）去协助筹办，并担任该刊物的公开代表人。该刊物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在发动全民抗战还是单纯依靠政府抗战等原则问题上，坚持了共产党

的正确主张。同时与进步教授吴承仕、张申府、杨秀峰等相配合，提倡“新启蒙运动”，对推动北方文教界的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类文章，一组文章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时事评论，体现了刊物的政治导向；另一组文章是关于体育和健康问题，可见这也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涉及体育和健康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马约翰先生写的《青年训练问题》，我父亲在南京中学和清华的同窗好友薛公绰写的《论民族健康》，以及我父亲写的《我的运动经验谈》。创刊号发什么文章应该都是主编精心选择的，说明蒋南翔同志在学生时代就认识到体育对青年健康成长和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后来他当清华校长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绝不是偶然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南翔和我父亲奉党组织指示一同南下，继续开展青年工作。在武汉期间，我父亲筹办了中共长



《北方青年》创刊号封面

□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秘密领导的公开刊物《战时青年》，中共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蒋南翔任主编，我父亲何礼（使用表字仲觉）是编辑、发行人兼社长。该刊物又作为全国学联的对外公开刊物，1938年1月10日创刊。创刊号序言说：“现在中国的青年，被时代课负着一副逾量的重担，肩头上压着重负的青年们现在应该怎样认清世界？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战斗？是特别需要研究的。不然，将不能在这个险恶的时期内挑得起肩上的重担。”说明办刊的宗旨都是当时青年们最关心的问题。作为“青年们自己的园地”，《战时青年》刊登的内容大体有两类。一类反映青年人的思想现状和问题，“一切青年朋友们能在这块园地里，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充分地讨论各种问题，互相交换一切工作的经验和批判”。另一类则为青年“经常介绍一点各方领袖的文章给读者参考，使青年朋友们可以有机会聆悉领导着中国现社会的一切前辈们的意见和指示”。如创刊号上曾刊登周恩来的《现阶段青年运动之性质及任务》，也刊登过叶剑英、张申府、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等各界领导人的文章。《战时青年》内容丰富，有短评、译文、信件、书评、人物介绍、木刻版画、漫画、现代诗和爱国歌曲等，在宣传和组织大后方青年运动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较大。当时的《战时青年》社不仅出刊物，还成为南方局青委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广大青年加强联系的联络点，通过这里向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不少青年学生和干部。当年杨学诚去新四军之前，就是同蒋南翔和我父亲一起商议准备工作的。

蒋南翔同志在办刊物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我母亲郑延的成长就得到他的鼓励和指导。我母亲考入西南联大后，观察到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写了一篇题为《西南联大生活拾零》的文章，登在联大的《腊月》壁报上，在同学中引起反响，她听好友陈琏说还上了三青团的黑名单。我父亲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直接领导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他将文章寄给了蒋南翔，并告知和我母亲订婚的消息。很快蒋南翔同志就回了信说：“文章已交给《战时青年》发表，小郑很能写，你要好好培养。”并对我父母的结合表示祝贺。我母亲的文章第一次在有影响的正式刊物上发表，受到很大鼓励。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母亲曾担任哈尔滨道里区委宣传部长，她通过采访为前线军队制作衣被的妇女们，写了一篇《絮行战线的妇女》的长篇报道。蒋南翔同志时任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他亲自为这篇报道写了按语：“这是描写哈尔滨道里区絮行工作的一篇生动的通讯。从这篇通讯中，不但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何受到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所以能够所向无



《战时青年》创刊号封面

敌，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旧社会连个名字也没有的被欺凌被压迫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都能充分地发挥她们的才能力量，成为英雄模范。”这篇文章登在1949年1月12日的《东北日报》上，为此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还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表扬了这篇文章。蒋南翔同志的按语给我母亲很大的鼓励，是她心中永远难忘的纪念。应该说母亲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和团中央成立初期蒋南翔同志对她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从深入实际敏锐观察社会中的问题，继而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阐述问题，直到良好的文笔文风，我母亲都受到蒋南翔同志很大的影响，这是我母亲生前多次说过的。前不久，我母亲当年的这两篇文章和蒋南翔同志按语的原版复印件，都被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龙美光老师找到了。时隔七八十年，看到当年蒋伯伯主办的报刊上刊登的我母亲的文章的原貌，真是感慨不已，那是他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忘我奋斗的青年时代的历史印记啊！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典范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南方局安排蒋南翔和我父亲先后撤回延安，在中央青委共同负责大后方工作组工作。延安整风后期，某位高层领导到中央青委贯彻康生的“抢救运动”精神，因为我父亲在云南从事过隐蔽战线工作，就被无端地怀疑成特务而被斗争和审查。蒋南翔对我父亲很了解，我父亲去云南工作就是他向南方局建议的，他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这样的做法，不因领导中央青委运动的

人地位高就随大流。他根据了解的许多事实，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审干中采取群众斗争方式的错误与危害，以及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向，大胆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党中央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我父亲也得到了平反。从蒋南翔同志的意见书可以看出，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到在审干和知识分子等工作中“左”的倾向的危害的高级干部，而这种错误后来又一再出现。直到“文革”后，党内才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蒋南翔同志当年所提意见的正确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针锋相对，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去建立根据地。任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东北开辟青年工作，为此，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负责组建“五四工作队”，我父亲奉命调集各单位干部九十余人，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历时三个多月到达东北。那时我和蒋伯伯的儿子延东都在母腹之中，也随队长征，过封锁线，翻越恒山，到东北才出生。当时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胜负未决，哈尔滨是解放区唯一的大城市，但这里的青年思想混乱，面临着选择什么政治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教育他们摆脱对国民党的盲目正统观念，引导他们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培养大批本地的青年干部，对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意义重大。1946年冬快放寒假时，战争形势紧迫，学校要做“长期打算、随时撤走”的准备。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市教育局蒋南翔同志领导下，开办了“哈尔滨市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蒋南翔任班主任，何礼任副主任。把大中学生中初期的积极分子共五百多人，集中起来学习。着重进行形势

□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教育，分析解放战争前途，解决对土改问题的认识等，蒋南翔和何礼亲自上课。通过学习，学生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在国民党尚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多数学生决心跟共产党走，体现了教育工作的成效。蒋南翔还创办了青干校并担任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许多干部后来成为东北三省的省市领导。在青年工作中，特别注意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引导青年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通过学习、讨论、辩论逐步提高认识，以理服人；注意采取适合青年人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方法，把政治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开展体育、歌咏、新秧歌等竞赛活动；在松花江的太阳岛上举办夏令营，创办“青年之家”，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解放战争时期蒋南翔领导的哈尔滨青年工作是一个典范，创造性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五四工作队”的任务。

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时，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某些同志和东北大学校长推崇北满一些中学组织贫雇农出身的学生斗争地富子弟的“经验”，批评哈尔滨市“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方针是“右倾”，一些学校发生了殴打、遣送地富子弟回乡的事情。我父亲时任哈尔滨市教委书记，在蒋南翔同志领导和支持下，坚决顶住了这种极“左”

的错误。蒋南翔同志并向东北局领导王稼祥、凯丰陈述意见，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使哈尔滨市各大中学校免于遭受一场灾难性的破坏。1948年1月，中共东北局正式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纠正了当时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观点，结束了这场争论。

1964年，中宣部向北京大学派出社教工作组，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盘否定陆平同志为首的北大校领导。蒋南翔不赞成这些极“左”的做法，但是他不便于直接干预中宣部工作组的工作，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以便向中央书记处反映他的意见。当时中宣部要求高教部推荐一些高校的领导参加社教工作组的工作，于是他动员我父亲参加，因为我父亲是陆平同志熟悉和信任的人，能够更好地沟通情况。但是我父亲刚调到吉林大学，工作刚刚开展，不想去蹚北大社教的浑水。蒋南翔对我父亲说，这件事涉及到对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的评价，是方向性的问题，比一个



1985年哈尔滨青干校一期学员合影，前排右8蒋南翔、右9何礼、右10郑延

学校的局部工作更重要，说服我父亲参加了北大社教工作。后来蒋南翔向中央书记处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体现了他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和政治敏锐性。

1980年我回清华进修，去看望何东昌同志，他告诉我正在帮蒋南翔准备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材料。鉴于“文革”对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破坏和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社会舆论和中央高层都有人主张优先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蒋南翔重新担任教育部部长，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是他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各级各类教育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比例均衡地发展。

并以建国后几次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高等教育，造成大起大落的事例，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听说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因此离开了教育部，王震同志邀请他去中央党校担任第一副校长。

以上仅就我所知道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蒋南翔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地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不盲从和跟风，即使和上级领导的意见不一致，也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历史会为他许多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做出公正的评价。

南翔同志和党校教育正规化

○辛守良



蒋南翔同志 1985年5月30日于中央党校

南翔同志是我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人生历程的晚年，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度过的，他作为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协助校长王震同志，为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不倦工作、呕心沥血，对党校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和南翔同志有直接接触是我调到

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办公室副主任，后任主任，在他领导下负责全校教学的组织、运行和管理工作。期间我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教育，受益终生。

1984年，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工作，通知我按约定时间到中央党校主楼与蒋南翔同志见面。党校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学府，我去工作不知能否胜任，有点犹豫。到党校见南翔同志时，党校副教育长兼教务办公室主任邢家鲤同志在座。南翔同志非常和蔼可亲，他先问了一些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党校教育要实行正规化，需要借鉴北京大学一些经验，想调你来党校负责教学组织管理。他以商量的口气，要我想一想做出回答。第一次见面，南翔同志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很快做出决定，来到中央党校工作。